

The evolu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thought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Yanmin Ma

GAOTANG No.1 Middle School, Liaocheng, Shandong, 2528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ere the key stag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dea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This period has experienced both the open and prosperous era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introverted reform of the Zhao and Song dynasties. The thought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has shown a clear evolution track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from the pluralistic pattern of “the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Legalism and Taoism,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hina and foreigners” in the Tang Dynasty, it has gradually turned to the introverted system of “building the country with Confucianism and Neo 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thought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in the Tang Dynasty was characterized by distinct stages, the foundation of “people-oriented compatibility” was laid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system integration”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and Confucianism revived in the crisi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The Song Dynasty took “preventing malpractice” as the core, and established the orthodoxy of Neo Confucianism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fter the initial centralized reconstruction and the mid-term reform debate. This evolution not only adapts to the governance needs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but also shapes the basic paradig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thought.

Keywords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thought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Ideological evolution;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唐宋时期治国思想的演变与实践探析

马艳敏

高唐县第一中学, 中国·山东聊城 252800

摘要

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史上, 唐宋时期是治国理念转型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既经历了盛唐的开放盛世, 也经历了赵宋的内敛变革, 治国思想随时代变迁呈现出清晰的演变轨迹: 从唐代“儒法道融合、华夷一体”的多元格局, 逐渐转向宋代“以儒立国、理学主导”的内敛体系。唐代治国思想阶段性鲜明, 初唐“民本兼容”奠基, 盛唐“制度整合”达鼎盛, 中晚唐于危机中启儒学复兴; 宋代以“防弊”为核心, 经初期集权重构、中期改革论争, 至南宋确立理学正统。这种演变不仅适应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治理需求, 更塑造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范式^[1]。

关键词

唐宋时期; 治国思想; 思想演变; 中央集权

1 唐代治国思想的演进: 从初唐奠基到中晚唐转型

唐代的治国思想随着王朝兴衰呈现阶段性特征。从初唐的“民本兼容”到盛唐的“制度整合”, 再到中晚唐的“危机反思”, 其思想演变始终围绕“如何维系大一统帝国稳定”这一核心命题展开。

1.1 初唐: 民本思想与多元兼容的奠基

隋末战乱的教训, 使初唐统治者认识到“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唐太宗在《贞观政要》提出“为君之道, 必

须先存百姓”, 将儒家民本思想转化为实践, 其治国思想有三大特征: 一是“与民休息”的经济理念。推行均田制, “凡十八岁以上男子受田一百亩”(《通典·食货》), 以租庸调制“输庸代役”减轻徭役, 形成“轻徭薄赋”传统。据《旧唐书·食货志》, 贞观年间户口从武德时 200 余万户增至 380 万户, 粮储“米斗不过三四钱”, 印证民本政策成效。二是“礼法合治”的制度设计。《唐律疏议》确立“德主刑辅”原则, 三省六部制实现分权制衡, 融合法家与儒家思想, 唐太宗强调“中书门下, 诏敕不稳便皆须执论”, 体现纠错机制。三是“华夷一体”的开放心态。唐太宗提出“朕独爱之如一”, 通过册封、吸纳少数民族将领、和亲等构建多民族共治格局, 文化上儒释道“三教并行”, 玄奘西行、鉴真东渡推动交流, 形成“兼容并蓄”氛围^[2]。

【作者简介】马艳敏, (1981-), 女, 中国山东高唐人, 本科, 中级教师, 从事高中历史研究。

1.2 盛唐：制度成熟与思想整合的鼎盛

开元年间，唐代国力达到顶峰，治国思想进入体系化整合阶段，这一时期的思想演变呈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理性的强化，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发展至完备形态，户籍管理推行“手实”“计帐”制度，实现对人口与土地的精准掌控，科举制规模扩大，“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反映其在选拔人才中的核心地位，推动社会阶层流动，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开元年间每年取士达千人，远超贞观时期，形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流动渠道；另一方面是思想融合的深化，武则天时期“令僧尼隶鸿胪寺，道士隶祠部”（《资治通鉴》），通过划分宗教事务管理权限来强化中央集权，佛教禅宗的本土化（如慧能“顿悟”说）与道教重玄学的发展，使其与儒学形成互补，唐玄宗亲自注释《孝经》《道德经》《金刚经》，试图构建“三教归一”的思想体系，体现了盛唐对多元思想的驾驭能力^[3]。

1.3 中晚唐：危机应对与思想转向的伏笔

安史之乱（755-763年）成为唐代治国思想转变的转折点，战乱暴露了均田制崩溃、藩镇割据、中央权威衰落等深层问题，迫使统治者重新思考治理路径，思想演变呈现两大趋势：其一为中央集权的强化诉求，唐德宗推行“两税法”以财产税取代人头税加强中央财政控制，唐宪宗通过军事打击实现“元和中兴”试图恢复中央对地方的掌控，而宦官专权与党争加剧使“如何约束权力”成为思想焦点，柳宗元《封建论》批判分封制、推崇郡县制，反映了对中央集权制度的理论辩护；其二是儒学复兴的思想暗流，面对佛道思想冲击与社会秩序紊乱，韩愈提出“道统论”试图重建儒学正统地位，柳宗元、刘禹锡通过“天人之际”的讨论为儒学注入理性精神，虽未在晚唐成主流，却为宋代理学诞生埋下伏笔。宋代治国思想是对唐代治理危机的历史回应，经历五代十国分裂动荡后，赵宋统治者以“防弊”为核心重构治国理念，推动思想体系从“多元兼容”转向“儒学独尊”，从“外向开拓”转向“内向守成”，形成独具特色的治理范式。

2 宋代治国思想的转型：从集权重构到理学主导

2.1 北宋初期：集权重构与“重文抑武”的定型

宋太祖、宋太宗在总结五代“兵强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教训的基础上，确立“强干弱枝”的治国方针，思想转型体现为三大举措：其一为“杯酒释兵权”背后的权力制衡思想，通过解除石守信等开国将领兵权，将军事力量收归中央，推行“更戍法”使“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同时设立枢密院掌军事决策、三衙掌军队指挥，形成“枢密院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三衙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的制衡机制（《宋史·职官志》），从制度上根除武将专权隐患；其二是“重文抑武”的政策导向，宋太祖立

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抬高文官地位，科举取士规模远超唐代，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一次录取进士109人，诸科200人，开创“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这种政策使士大夫阶层成为治国核心力量，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宣言正是这一群体政治自觉的体现；其三为“守内虚外”的国防思想，面对辽、西夏的外部压力，宋代初期采取防御姿态，将治理重心放在内部稳定，宋太宗曾言：“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续资治通鉴长编》），这种思想导致边防松弛，却客观上为经济文化发展创造了稳定的内部环境。

2.2 北宋中期：改革思潮与思想论争的激荡

宋仁宗以后，“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日益严重，治国思想聚焦于“如何实现富国强兵”，形成改革与保守的思想交锋：王安石变法代表“功利主义”改革思潮，他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提出“因民所利而利之”的治理理念，推行青苗法（政府放贷助农）、募役法（以钱代役）、市易法（调节市场）等政策，试图通过国家干预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其思想融合儒家“经世致用”与法家“国家本位”，强调制度变革的实效性；司马光、苏轼等则代表“保守主义”思潮，司马光在《与王介甫书》中批判变法“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主张“祖宗之法不可变”，强调传统制度的稳定性与道德教化的重要性，苏轼则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反对过度干预民生，体现儒家“藏富于民”的思想传统；这场论争的深层是治国理念的分歧，王安石强调“法”的变革，司马光重视“礼”的维系，前者追求国家富强，后者侧重社会稳定，尽管变法最终失败，但其推动的思想论争为理学发展提供了土壤^[4]。

2.3 南宋：理学正统化与“内圣外王”的哲学化

南宋偏安后，外受金与蒙古侵扰，内遭士大夫党争困扰，治国思想转向“内圣”追求，理学渐成官方哲学，完成三大理论建构。“天理”本体论方面，北宋二程提出“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将儒家伦理升为宇宙本体；朱熹进一步构建“理气论”，主张“理在气先”，认为“三纲五常”是“天理”体现，如《朱子语类》言“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为封建等级制度提供哲学辩护。方法论上，朱熹主张“格物致知”，通过认知事物把握“天理”，将道德修养与知识探索结合，形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路径，实现伦理与政治统一。价值层面，针对王安石变法“功利”倾向，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陆九渊心学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聚焦内心自觉，与朱熹“格物”互补。宋理宗时，理学被列为科举内容，确立官方哲学地位，影响后世近700年中国政治思想。

3 唐宋治国思想演变的动因与内在逻辑。

唐宋治国思想的转型并非偶然，而是政治危机、经济变革、社会结构变动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演变呈现清晰的内在逻辑^[5]。

3.1 政治危机驱动的思想调整

唐代安史之乱与五代战乱是思想转型的直接诱因。安史之乱暴露唐代“外重内轻”制度缺陷，促使中晚唐思想家反思中央与地方关系，柳宗元《封建论》主张“郡县制优于分封制”，为宋代中央集权提供理论依据；五代“五十三年间，易五姓十三君”的政权更迭，使宋代统治者以“防乱”为首要目标，“重文抑武”“强干弱枝”皆源于对武将专权的恐惧。

宋代与辽、金、西夏长期对峙，强化了内向型治理倾向。与唐代“天可汗”地位不同，宋代面临“积贫积弱”外部压力，这种“不安全感”使其治国思想从“开拓”转向“守成”，理学对“内圣”的强调，本质是对外部困境的精神回应。

3.2 经济结构变革的深层影响

唐代均田制的崩溃与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治国思想从“重农抑商”向“农商并重”微调。唐代前期均田制下，政府通过控制土地实现对农民的直接统治，治国思想强调“重农固本”；安史之乱后，均田制瓦解，土地兼并加剧，两税法以财产为征税基准，客观上承认了土地私有与商品经济的合法性。

宋代“不立田制”，土地兼并合法化，加上“交子”（世界最早纸币）的出现、海外贸易的繁荣（广州、泉州等港口的兴起），使商品经济达到古代顶峰。这种经济结构变革，促使宋代治国思想出现务实倾向；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均输法，本质上是国家对商品经济的调控；苏轼、叶适等思想家提出“农商皆本”，反映了经济变革对思想的影响。

3.3 社会结构变动与思想主体的转换

士族门阀的衰落与士大夫阶层的崛起，是思想转型的社会基础。唐代前期，关陇贵族、山东士族仍掌握政治主导权，治国思想带有“贵族政治”色彩；武则天时期通过科举打击士族，安史之乱后士族彻底衰落，庶族地主登上政治舞台。

宋代科举制的完善（糊名、誊录制度杜绝舞弊）使“取士不问家世”成为现实，士大夫阶层（主要由庶族地主组成）成为治国核心力量。这一群体兼具“学者”与“官僚”双重

身份，既推崇儒家伦理，又关注现实治理，推动治国思想从唐代的“制度建构”转向宋代的“伦理实践”，理学的“内圣外王”正是这一群体精神需求的体现。

3.4 思想自身的演进逻辑

从“多元融合”到“儒学独尊”，体现了思想体系从“包容”到“精致”的发展轨迹。唐代治国思想兼容儒法道，虽具开放性但缺乏系统性；中晚唐儒学复兴运动为儒学注入理性精神，宋代思想家在此基础上吸收佛道思辨方法，构建起理学的哲学体系，使儒学从伦理学说升华为系统的宇宙观，完成了对多元思想的整合与超越。

4 对当代治理的启示

唐宋治国思想中的民本理念（如唐代“存百姓”、宋代“因民所利”）与当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通；“礼法合治”的经验为现代法治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提示法律与道德需协同发力；唐代的开放包容与宋代的制度创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启示意义。

5 结论

唐宋时期治国思想的演变，是一部回应时代问题的“探索史”：唐代以多元兼容构建了盛世帝国，宋代以儒学重构应对了治理危机，二者虽路径不同，却共同指向“如何实现长治久安”的终极命题；从“华夷一体”到“重文抑武”，从“礼法合治”到“理学主导”，演变背后是对治国规律的持续探索，而在当代中国，梳理这一演变轨迹，不仅能深化对传统政治智慧的理解，更能从中汲取平衡稳定与发展、开放与自主、制度与伦理的治理经验，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滋养，正如钱穆所言：“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唐宋治国思想的转型，恰是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关键密码。

参考文献

- [1] 王立峰,潘博.传统法政文化的演变轨迹[N].学习时报,2017-11-20(003).
- [2] 付正.《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D].中共中央党校,2019.
- [3] 韩明士,谢康伦,刘云军.《为世界排序:宋代的国家与社会》[J].两岸关系,2022,(03):66-67.
- [4] 竺鼎天.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J].书城,2025,(03):122-124.
- [5]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M].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01:741.